

□戴永夏

巍巍泰山，雄踞齐鲁，不但文化底蕴丰厚，名胜古迹荟萃，而且古树名木繁多，苍松翠柏满山，有着丰富的植被资源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古代的泰山曾经“茂林满山，合围高木不知有几”“朱樱满地，古木参天”“凌汉峰南竹树森森，未风先鸣”“盘道两侧，茂林润草”，森林景观十分壮美。清末以后，泰山植被曾遭受严重破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经过全面绿化，泰山重披绿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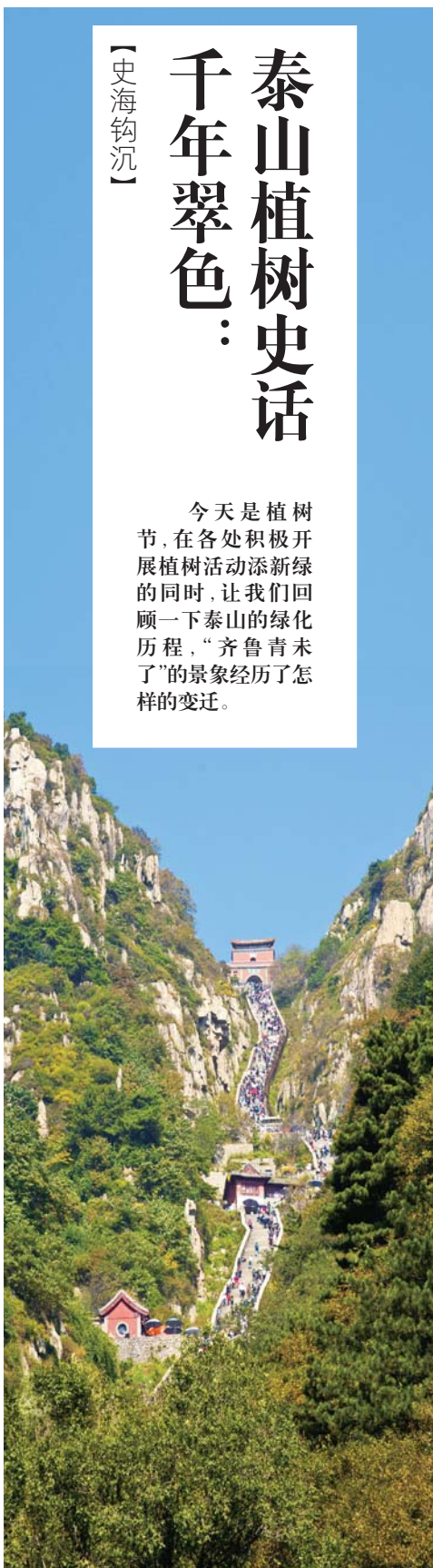
据史书记载，始皇二十八年(前219)，秦始皇登封泰山时，面对山上的草木森森，曾下令“勿伐草木”。下山途中遇大雨，他在一棵树下避雨，因感谢树的遮雨之功，封这棵大树为“五大夫”。这棵“五大夫”树，至东汉具体为“五大夫松”。至明代，松树被泥石流冲毁。清雍正八年，负责修整泰山的内务府郎中丁皂保又进行了补栽，成为五棵“五大夫松”，至今尚存两棵。

到了汉代，汉武帝刘彻曾经七次登泰山，植柏树一千多株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引《从征记》云：“泰山庙中，柏树夹两阶，大二十围，盖汉武帝所植也。”至今，泰山下的岱庙中，还留下五株汉柏，皆扭结上耸，苍劲葱郁，若虬龙盘曲，构成闻名中外的“汉柏凌寒”美景，为“泰安八景”之一。

至唐代，唐玄宗认为槐树是“士大夫”，把槐树尊为“国树”，到处栽种。唐高宗、唐玄宗登封泰山时，也将植槐之风带上泰山。《中朝故事》记载：“天街两畔槐树，俗号为‘槐衙’……意谓其成行列，如排衙也。”唐开元十三年，唐玄宗封禅泰山，降旨禁止乱砍滥伐山上的树木：“封泰山神为天齐王，礼秩加三公一等，近山十里，禁止樵采。”

宋真宗是最后一个封禅泰山的皇帝。尽管他登泰山是为了提升个人形象，但对保护泰山的树木也有一定贡献。大中祥符元年(1008)，他曾降旨：“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，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，社首、徂徕山并禁樵采。”登山道中，“树当道者令勿伐。”他把禁止樵采的范围扩大到了泰山附近的社首、徂徕等山。

金朝皇帝虽然没有封禅泰山，但对泰山的绿化也比较关心。金大定六年(1166)，金世宗降诏：“推恩天下山泽以赐贫民，任其樵者薪之，匠者材焉。唯灵岩同五岳留护灵脉，不在赐例。采伐者仍治以罪。”在诏令中，他准许百姓到山上采薪伐木，唯独不准采伐灵岩和五岳的树木，违者就要治罪。金章宗时，山东的一些起义军潜藏在泰山上，跟官军对抗。按察司为彻底消灭起义军，准备发兵数万，伐尽泰山林木，使起义军无藏身之地。时任山东路统军使的完颜承晖听说后，上疏金章宗：“泰山五岳之宗，故曰岱宗，王者受命封禅告代。国家



泰山植树史话

【史海钩沉】
千年翠色：
今天是植树节，在各处积极开展植树活动添新绿的同时，让我们回顾一下泰山的绿化历程，“齐鲁青未了”的景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。

虽不行此事，而山亦不可赭(即伐光树木，使之成为荒山秃岭)也……”他的意见被金章宗采纳，使泰山林木免遭伐尽之灾。

清代曾多次开展泰山植树活动。如康熙八年至十七年，山东布政使施天裔修缮岱庙时，曾植树646株，这在康熙十七年立的“重修岱庙碑”碑记中作了详细记述：“(岱庙)午门内栽柏树八十五株，杨树四十株，槐树二十二株，白果树二株。仁安门前栽柏树五十三株，槐树十二株。大殿左右丹墀栽柏树五十九株，松树四株，白果树二株，杨树五株，槐树九株……”现在岱庙内松柏苍翠，古木参天，就是这次植树之功。而泰山景区内更大规模的植树，发生在嘉庆年间。据嘉庆二年《泰山种柏道里记碑》记载，山东按察使康基田及泰安知府金 等16位官员，于嘉庆元年三年连续在泰山植树，范围从岱宗坊沿登山盘道直至南天门下的独秀峰和升仙坊，还有吕祖阁等地，共植柏树22000余株。

清末以后，由于军阀混战，连年战乱，泰山植被遭到严重破坏。在此情况下，一些有识之士仍没有放弃泰山的绿化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有“植树将军”之称的冯玉祥。他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植树造林。20世纪30年代隐居泰山期间，他仍发扬此风在泰山植树，两年多时间内共植树约30万棵。1934年，他派人买来大量苹果、茶、核桃等树苗，分给百姓种植，还专门请来专家进行指导。

然而，冯将军的力量毕竟有限，泰山植被惨遭破坏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。真正让泰山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，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泰安民众。

1948年3月，泰山专署颁布了《关于森林树木保护的布告》，要求爱护现有树木，奖励封山造林；同年9月建立泰历林场(后改为泰山林场)。1949年9月，鲁中南泰山专员公署发布布告，强调：“为保(泰山)残存的名胜古迹，如唐槐、汉柏、李斯篆、金刚经、古庙、铜像等，除本署成立泰山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外，尚望大家负责切实保护。”“今后倘有人故意损毁破坏，一经察觉或被告发，定予严惩不贷！”

上世纪50年代，泰山林场工人开始了泰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，历时近十年，使得泰山重披绿装，植树面积达35万亩，栽种各种树木在亿株以上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泰山生态保护被列入生命线工程来抓，泰山的植被重现英姿，森林覆盖率达80%以上，植被覆盖率高达90%。置身岱顶四望，“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”的美丽壮观景象，复又展现在面前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故事里的沂蒙

“活烈士”韩成山

1947年，国民党军队疯狂向解放区进攻。沂蒙山区作为革命老区，自然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“格外照顾”，蒋介石派出王牌74师进行“围剿”，企图一举消灭我革命力量。

这年4月，按照上级指示，韩成山所在的华东野战军8纵24师70团3营7连负责从正面阻击敌74师，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。

4月26日凌晨，韩成山跟随部队急行军20华里，赶到黄崖山。我军刚把兵力布置好，74师就“兵临山下”。敌军先是以四架飞机、两个炮兵营对黄崖山阵地进行狂轰滥炸，然后以一个营的兵力发起冲锋。

战斗进行得很惨烈，敌人一个营被打退了，再增加一个营；两个营被打退了，又以一个团从正面进攻。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，镇守阵地的7连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七八次进攻。7连战士伤亡过半，弹药将尽，情况十分危急。

这时，我8纵部队从蒙山安全转移，上级命令7连迅速撤出战斗。但是，此时坚守黄崖山主峰的7连一排被敌军死死包围。

黄崖山主峰西面是深480米的悬崖，北面是深沟，而此时国民党士兵从东面的坡上蝗虫似的涌上来。

“同志们，人在阵地在，跟敌人拼到底！”排长朱际昌下了命令，不久，子弹、手榴弹都打光了，战士们抱起石头砸向敌人。

这时，韩成山听到距离阵地十多米的敌人高叫着：“抓活的！”朱际昌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扔向敌人，随后纵身跳下悬崖，韩成山也随着排长纵身一跃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韩成山醒了过来，眼前是满天的繁星。“难道我还活着？”韩成山想站起来，却感到钻心的疼痛。他发现右腿骨折了，右手拇指被打断了，浑身上下全是伤。韩成山已经一天两夜滴水未进，又累又渴。

好不容易到了天亮，他突然发现有个体发花白的老农向他走来。“大爷，给我点水喝。”韩成山说。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老农惊讶地问。

“我是八路军。”一听韩成山是八路军，老农迅速将他背到一个大石洞里藏起来。

老农名叫石贞文，是蒙阴县垛庄镇东大洼村人。石贞文每天都给韩成山送来煎饼和水，并采草药给他治病。当时食盐紧缺，石贞文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盐拿出来给韩成山洗伤口。

一次，石贞文给韩成山送来了羊肉汤，一问才知道，老人将家里仅有的一只小羊宰了。跳崖时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韩成山，被感动得热泪直流。

在石贞文的精心照料下，韩成山先后转移了四个隐藏的地方，养伤71天，右腿和右手的骨折处基本愈合。而这时还乡团还在不断地搜山，石贞文赶紧制作了一对拐杖，烙了一大包煎饼，趁黑夜将韩成山送下山。韩成山架着双拐，经过七夜的夜行，平安回到老家沂南县辛集镇招贤村。

后来，韩成山才知道，黄崖山一战，我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成功阻击了74师两个团的进攻，消灭了600多个敌人。韩成山所在的7连被授予“英雄连”的称号。战斗后不久，部队在沂水县隆重举行追悼大会，沉痛悼念在黄崖山阻击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，其中就包括韩成山，韩成山的名字被刻在了孟良崮烈士陵园的石壁上。

直到1977年，当年参加过黄崖山战役的机枪班班长刘楹厚在寻访战斗旧址时，偶然得知当年“牺牲”的“烈士”韩成山还活着，才把这位在家乡隐居30年的战斗英雄“挖”了出来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□赵瑞峰

在桓台县城北有一处“周环百里，水天一色”的自然湖泊，以其生态天然、物产丰富，沿湖村庄星罗棋布、舟楫相通，有“北国江南”之誉，这便是闻名遐迩的马踏湖。因春秋时期，“齐景公有马千驷，畋于青丘”，众马奔驰于此地而得名马踏湖。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，它并不叫马踏湖，而叫锦秋湖，当地人也叫北湖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恢复此名。千百年来，马踏湖以其秀丽独特的风光，吸引着四方游客，更是留下了一众名士贤达的足迹，如唐代诗人骆宾王、元代地理学家于钦等。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家族的王之都、王象良、王象明和一代诗宗王渔洋，生于斯长于斯，更是诗以咏之。作为王氏家族重要成员的王象春，则把马踏湖作为身心得以休憩的一方所在。

王象春(1578—1632)，字季木，号文水，自号山昔湖居士，山东新城(今桓台县新城镇)人，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中进士，官至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。王象春中进士

明代王象春的马踏湖游记

后，未被授予官职，次年初返回新城，等候任命。回到故乡后，王象春寄情山水，吟赏烟霞，泛舟马踏湖，失意沮丧之情很快得到平复。

清康熙《新城县志》载有王象春的《北湖游记》和《北湖游别记》。这两篇游记正是王象春从北京归来，在家等候任命期间，赏游马踏湖时的乘兴之作。这两篇游记语言清新质朴，工于比兴，巧于用典，把游湖经历、名胜古迹、湖产名材及湖乡人的热情好客描摹得极为生动传神。他在《北湖游别记》的最后还发出“此水视杭之西湖与燕之裂帛，宏阔不啻倍之”的慨叹，以及“幸处僻寂，名不闻于四方，非耽奇穷幽者不至，鱼鸟草木乃得全其种而终其天，亦湖之老而休逸时哉”的庆幸和欣喜之情跃然纸上。

吟咏马踏湖的诗词作品为数众多，但以游记形式全面记叙马踏湖者，只有王象春的这两篇游记，因而弥足珍贵，成为了说明清时期马踏湖难得的历史文献。

明天启五年(1625)，在南京吏部任上的

王象春，因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魏宗贤的斗争，受到削夺官职、永不录用的处罚。于是，王象春带着愤恨和不甘，回到了家乡新城。马踏湖一如既往地接纳了这位失意的仕人，抚慰其受伤的心灵。

从天启六年(1626)至崇祯五年(1632)，王象春在家乡新城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七年。在这七年里，他除平日与族中兄弟子侄一起读书赋诗，还不止一次泛舟同游马踏湖，写下不少诗作。如《锦秋湖》诗：“西湖名胜古擅长，剩有锦秋可比仿。若把西湖移岸上，新城真号小钱塘。”还有一首《湖雨》，乃雨中游马踏湖而作，诗曰：“两湖十里隔西东，莲曲菱歌声不同。苏老只怜晴潋滟，哪知一样色空濛。”这两首诗清新自然，表达了诗人对马踏湖风光的自豪之情，以及对家乡深深的眷恋。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ilu@163.com